

“清华人”是我最骄傲的名字

○ 阎勇

阎勇

英国肯特大学教授，工程学院科研主管，仪表、控制和嵌入式系统研究中心主任。1980年~1988年就读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获得学士及硕士学位。1989年赴英国留学，2001年成为英国仪器仪表领域中的首位华人教授。他是英国“国家测量局”创新研发和流量测量专家组首席科学家，英国工程技术学会、测控学会、物理学会的会士、美国IEEE院士。2005年被聘为浙江大学光彪特聘教授。2006年入选天津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1980年我从内蒙古丰镇一中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考上清华的丰镇人。当年考入清华纯属偶然。那时的高考是先报志愿后考试。当我把填好的志愿表交到学校后，我的数学老师王敦全代表教研室找我谈话，鼓励我将清华作为重点大学的第一志愿。我当初犹豫不定，觉得清华可望而不可及。我的大哥在“文革”期间因家庭背景问题失去了读高中的机会，尽管“文革”早已结束，但其遗留下来的阴影让父母对我的升学问题十分担忧。经过一番斟酌，最终我重新填写了一张志愿表，报考了清华。当我拿到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录取通知书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当时我还在马桥街小学粉笔厂打工。很多人非常惊讶，一个穿着破衣烂衫，个头不高，满脸粉尘的小男孩会考上清华。

进入清华后我把学习放在了第一位。清华的五年，是我汲取科学技术知识和锻炼工程技能的五年。1985年本科毕业时我获得了首届保送研究生资格。硕士研究课题使我对科学研究有了初步

的认识，专业技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1988年硕士毕业后我被留在自动化系检测教研组任教。当年留校的很多青年教工忙于考托福，准备出国，但我根本没有要出国的打算，只想在清华好好干一番。当时我又教课又当班主任，兼任年级主任，每天都干劲十足，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89年春，教研组主任王家祯教授找到我，说英国一所大学在招聘研究助理，他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希望我代表清华参加应聘。系主任王森教授也给了我很大鼓励。当时国内很多高校都派出应聘者，两三个月后，当我得知我得到了这个职位时，真有点喜出望外。1989年10月我飞赴英国，进入位于英格兰东北部的提塞德（Teesside）大学，师从著名的颗粒流流量测量专家库塔德（Coulthard）教授和核物理学家布恩（Byrne）博士，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研究助理工作，兼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基于静电与核辐射传感器的颗粒流流量测量。到英不久，我发现提塞德大学地理位置偏僻，尽管在颗粒流流量研究方面很著名，但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远不如清华，曾一度后悔不该出国。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决定既来之则安之。记得当初我用很短的时间把一台气液混合流实验装置上的仪表和装置通过接口与计算机相接，实现了数据采集和实验操作自动化，两位导师对此赞不绝口。在后来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专注于博士课题，终于在第三年底完成并递交了博士论文。我博士期间研制出的颗粒流流量测量系统在苏格兰电力公司燃煤发电厂成功试运行，并引起该公司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为此，苏格兰电力公司为我提供了两年博士后工作的资助，以便我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1992年10月我开始做博士后不久，系里要招聘一名教应用物理的讲师，两位导师都鼓励我申请。我当时并不是很积极，从没想过要在英国当教师，但最后还是决定去试试。后来得知当时应聘该职位的有二十多人，大多数都有博士学位。经过初选，我进入了最后面试，也是六位候选人中唯一的外国人。面试分两个部分，首先由



阎勇教授（左二）在2006年IET工程技术创新奖颁奖仪式上



阎勇（右一）和他的博士研究生及家属

候选人做一个学术报告，然后是“多对一”式的提问。我清楚地记得报告部分是我面试的薄弱环节，因为英文毕竟不是母语。庆幸的是在我读博士期间曾帮导师带过一些课，也在大小各种场合做过多次学术报告。这对提高我用英文授课的能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天晚上系主任通知我得到了那个职位。

1993年9月，我正式成为了提塞德大学的讲师。这也正是我学术生涯中的关键一步。最初的两年，教学和科研都还算得心应手。后来逐步发现科研工作很难开拓。原因之一是和前导师在一起工作，总是放不开手脚；另外提塞德大学地理位置偏僻，不利于开展合作研究和获取科研经费；同时觉得在一所大学工作太久会缺乏新鲜感和挑战性。因此，我便逐渐产生了离开此校，独闯天下的愿望。

1996年年初，我偶然发现格林威治大学（University of Greenwich）的招聘广告，便决定一试。博士期间我曾在该校做过两个星期的实验，对那里的情况比较了解。经历一番申请、推荐和面试，我于1996年9月被聘为格林威治大学工程学院的高级讲师。该校位于英格兰东南部，是英国经济和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进入该校后，教学更对路了，我先后讲授模拟电子，微机接口，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建模，计算机仿真和科研方法论等本科和硕士课程。

此外，我在科研方面也投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借助良好的科研政策和环境，加上勤奋耕耘，我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到

五年功夫，我不但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和实验设备，而且成功地从英国政府机构、各个基金会、欧共体和工业界等得到二十多项科研课题，研究经费超过二百多万英镑。更值得一提的是我向英国贸工部及其相关机构总共申报了8个研究课题，取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率。研究领域也从单一的颗粒流流量测量扩展到颗粒粒度在线测量、工业炉火焰成像与测量、火力发电中燃料在线跟踪、柴油发动机油雾喷吹特征化、无铅激光焊接在线监测、粒状食品质量检验和真伪鉴定等。

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我的科研队伍也不断壮大。我深知一流的科研需要一流的人才，因此十分注重物色人才。一个以科研组为技术中心，以多个工业伙伴为服务对象的合作网络逐步形成。以此网络为基础，我于1998年8月创建了格林威治先进仪表及控制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我们研制的新型静电式颗粒流量测量仪和数字式火焰成像监测系统成功地投入工业使用，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得到了用户的广泛认可和赞赏。我们在英国学术界和工业界逐步赢得了自己的声誉，也与许多欧洲国家的同行，包括法国、德国、瑞士、丹麦和葡萄牙等建立了多种合作关系。与此同时，我们还与国内同行，包括清华自动化系、天津大学自动化系、浙江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华北电力大学等，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与合作。此外，我的科研组每年在主要学术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十多篇学术论文，多数被SCI和EI收录，并被许多行业的学者和技术人员引用。我先后成为英国测控协会和物理协会的会士，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协会的高级会员，并应邀在多个学术机构兼职，担任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和特约编辑等。由于科研成绩突出，我于1998年9月提升为Reader。三年后升为教授，成为格林威治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从讲师到教授，我仅用了8年时间，这在英国大学里并不常见。许多朋友和同事都好奇地问我有什么窍门，这么快就“爬完了学术梯子”，我的答案很简单：清华的功夫加上严肃的敬业态度。清华堪称中国的剑桥，在那里苦练8年，功夫自然非同一般。另外我趁别人休闲的时候多登了几步，因此比别人快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常应邀在国际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做学术报告。报告之后，总有人问我从哪来，毕业于哪所大学。我总是自豪地说我毕业于北京的清华大学。2003年